

老照片

第六十辑

为「中央文革」做记者的日子（下） 邢文举

在苦难中磨砺 赵 细

与母亲的合影 李亦园

走进历史的卜少夫 李 伟

再读司徒雷登 沈建中

郎静山镜头里的名人往事（二） 蔡登山

老照片上的题识 谭金土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目 录

邢文学 为“中央文革”做记者的日子(下).....1

一位普通的部队宣传干事,被临时调任

“中央文革记者”后的非凡经历.....

赵 纲 在苦难中磨砺.....15

——写在父亲赵偈生先生的祭日里

二十多年在劫难逃的苦难,铸就了他深沉、稳健的一代学人必备的素质.....

时玉珍 我的姥姥.....37

祝伟坡 先父的两张老照片.....44

李亦园 与母亲的合影.....49

徐小五 老照片引起的回忆.....52

李 伟 走进历史的少夫.....69

他一天要接一百个电话、看二十份报纸,
参加八个聚会、五个饭局,当然还要编杂志写
记住他,也就

沈建中87

陈志超 我与孙瑜的忘年交.....95

蔡登山 郎静山镜头里的名人往事(二).....100

黄 岩 出国筑路亲历记.....110

特殊的年代,保密的任务,引起作者的一段回忆.....

徐化扬 我的大学生涯.....121

蒋世承	1934年五世同堂的合影·····	133
谭金土	老照片上的题识·····	137
夏伟	1930年代的莱阳乡师·····	149
程以正	在建中的慈禧陵隆恩殿·····	157
张远航	1930年版的《南京影集》·····	160
冯克力	“真相”种种·····	172

出版人 郭海涛
主 编 冯克力
执行编辑 张杰
特邀编辑 丁东 邵建
美术编辑 王芳

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，须经本社同意。



为“中央文革”做记者的日子（下）

邢文举 口述 杨民青 整理

周总理在上海听取我的汇报

我如实汇报了江苏的夺权情况，于是，“好派”对我表示强烈不满，“屁派”则认为我是他们的支持者。一时间，南京街头出现截然不同的大标语和大字报——“好派”说：“《解放军报》记者邢文举是不受欢迎的人！”“屁派”说：“《解放军报》记者邢文举是坚定的革命左派！”

1967年2月底，我从北京回到南京。4月底，徐学增来电话：“王力同志决定你去上海，加强那里的力量。”就这样，我离开呆了五个多月的南京来到上海。

当时的“中央文革”上海记者组，有郑晓峰、蒋宝琪、孙朴芳、许志成等四个人，加上我共五人。作为“文革”重灾区，“四人帮”在上海的追随者众多，是非自然也多。我们住在上海延安饭店，这是一栋五层楼，我们住在第四层，这一层是延安饭店的高档房间。

1967年夏天，周总理陪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及夫人访问上海。“中央文革”上海记者组派我到机场采访。那天到机场迎接的，除了上海市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徐景贤、王秀珍等人，还组织了一些欢迎群众，场面挺壮观。这是上海夺权以后的首次外事活动，有关部门



图1 1966年冬，作者在南京。

担心缺少经验，生怕考虑不周出洋相，而结果偏偏如此。

专机在停机坪停稳后，卡翁达总统首先走出机舱，接着是周总理，然后是卡翁达总统夫人及其他随行人员。

开始，欢迎人群还能保持一定队形，但等卡翁达和周总理走下飞机，前面的领导就先乱了套，在场的人，个个急着抢先目睹周总理，顾不上什么外事纪律了，人们把周总理团团围住，将卡翁达总统和夫人抛在了一边。

周总理拨开围着他的人群，对工作人员喊道：“总统呢？夫人呢？”说着，总理将卡翁达和夫人推到前边，把前来欢迎的上海市的领导一一介绍给总统和夫人。徐景贤当时是上海的第三把手，

人称“徐老三”。徐景贤握着总理的手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总理，我们组织得太不好了，请总理一定原谅，一定原谅。”这时，混乱的欢迎人群才稍稍平静下来。

当时我站在一边，听周总理回答徐景贤说：“非常时期，非常时期，出一些事在所难免，可以理解，不怨你们嘛，以后就有经验了。”

第二天晚上，周总理召我去他下榻的宾馆汇报工作。事前，听徐景贤说周总理已让上海同志汇报了一次。

那时我对马天水的印象不错，我向总理汇报说，马老是多年分管工业的老干部，对上海的工业生产很熟悉，上海电力紧张，每次开会分配用电指标，马天水不用拿本子，哪个企业该给多少电，他都说得一清二楚。

我还向周总理汇报了青浦的武斗情况，我说，当地农民对红卫兵的行动不理解，有些农民拿着铁棍，见到前去造反的红卫兵就打，声称要进城找红卫兵算账。“工总司”头头王洪文派去大批工人，才将事件平息。

周总理说，农民和红卫兵发生矛盾，这是个新问题，一定要认真研究，吸取教训，要教育好农民，不能和红卫兵对立。我的汇报一直持续到深夜，秘书不时送来急件，请总理批示。

汇报结束时，周总理问我：“江苏的情况，你还知道不知道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调到上海后，对江苏的情况不大清楚。”已是深夜，我注意到，总理秘书早在一边直打瞌睡。

周总理送走卡翁达起程返京的那天早上，我正在上海无线电七厂采访，上海市革委会打来电话，通知我到机场送行，嘱咐我一定要快，不然就赶不上了。我立即让司机驱车直奔机场。为了赶时间，司机不管红灯绿灯，一路飞驰。司机对去虹桥机场的道路十分熟悉，此前，我们写的上报材料，都是送到机场由民航航班机飞行员带到北京的。“中央文革”与民航局有约定，各地的“中央文革记者”可通过民航航班机传送文稿。我们和虹桥机场的人很熟，需要乘飞

机，不必事先购票，只要有座位，就允许我们上飞机。

我们飞车赶到机场，几分钟后，周总理的车就到了。记得那天前来送行的，只有徐景贤、马天水、王少庸、王秀珍等很少几个人。总理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，说：“我已经说了不让你们送，怎么还来送啊？”

许世友将军

我们所住的延安饭店四层有一个套间，那是许世友司令员来上海住的地方，他的夫人田普经常住在那里。那时的王洪文，仅是上海“工总司”的造反派头头，后来为了工作方便，给王洪文在延安饭店的二楼安排了一个普通房间。

早在南京时，我就和许世友、田普熟悉了。那时的许司令，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华东饭店，到我们记者组坐一坐，唠一唠，既谈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也唠家常。记者中，我算比较健谈的，许司令性格豪爽，很愿与我交谈。

在南京，许司令曾多次请我吃饭，有时一个星期请一次。许司令请我吃饭，其中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我也能喝些酒。许司令愿意交往能喝酒的记者。许司令请客，第一道菜是狗肉，然后是野鸭、野鸡等野味。我们俩一顿一瓶茅台酒，一边对饮，一边闲谈。在安徽，许司令曾请驻那里的“中央文革”记者刘慎思吃饭，刘慎思后来写了一篇回忆文章《我曾与许世友司令员对饮》。

许司令爱喝酒爱请客，为了表示支持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他曾宴请江苏省和南京市搞“三支两军”的同志，要他们一定按毛主席指示办事，搞好“三支两军”。许司令也宴请过江苏省的造反派，但他请的都是拥军派，对“反军派”、“乱军派”，他理也不理。

其实，闲谈也离不开政治。1966年的冬天，聂元梓、蒯大富来南京，住在南京大学匡亚明的房子里，找我谈江苏的情况，我与他们谈了一个钟头。事后的一天，许世友来到华东饭店，当时正好我



图2 1966年冬,许世友(左二)与“中央文革”记者们合影。左一为作者。

一个人在家值班。

许司令员对我说：“那天，造反派在五台山体育场开批斗大会，聂元梓、蒯大富他们，给江渭清戴高帽子、戴风筝，对革命老干部，他们怎么能这么做呢？那天我给周总理打电话了，周总理说，我们说他们不听啊。你说，他们算什么东西？……什么造反派，我看不是好人。我给毛主席打电话了，我说，主席，我要把他们给干掉。毛主席对我说，你可不能给我动他们！我说，好，主席不让动，我就不动。可我总觉得他们不像好人！”

在南京“红总”准备夺权的日子，许司令把我紧急叫到南京军区作战值班室，我进门一看，里面坐满了人，都是负责作战的高级指挥员。其中有我认识的张才千副司令，他后来调任总参副总长。许司令见我赶到，大声对我说：“邢记者，你快去给我查一查，听说今天晚上，造反派要抄江苏省委所有十三级以上老干部的家，我让作战部下令了，只要他们敢抄家，我就下令开枪，我已经请示叶帅了，他们同意！你赶快给我查查！要不然我就开枪啦！”

我马上随保卫干事前往各“造反司令部”，足足查了两个多小时，未发现要抄家的迹象。我马上赶回向许司令汇报。许司令说，还是你们调查的情况准确。宣布散会。

南京“一·二六”夺权后，许世友执意住进大别山，远离是非之地。我听田普说，大别山生活条件简陋，洗澡还得用木盆，很不方便。有一天，田普给我打电话：邢记者，还是你劝劝许司令吧，请他回来住吧。于是，我按照田普的要求，直接给在大别山的许司令打电话，请他到上海。

在上海，许司令住进刘伯承元帅住过的别墅。不久，许司令的秘书来接我，要我立即前去。记得那天赴宴的有徐景贤、王洪文、马天水、王秀珍、王少庸等人。令我感动的是，尽管后来我被江青点名，关在“中央文革”的“小号”里接受审查，以后只要有政治运动，就要被审查一遍；许司令及夫人田普、女儿田小兵与我的友谊一直没有中断，始终没有把我当坏人而疏远我。



图3 许世友女儿田小兵赠给作者的照片。

1969年11月，我已回到沈阳军区原单位工作，为女儿和外甥女的参军问题，曾贸然打电话给田普，试探地问她，能不能送几个女孩子到南京军区当兵。许司令和田普满口答应说，送孩子当兵是好事，来吧，几个都行。

我带着两个女孩子来到南京，田普对有关部门说，许司令员有

命令，给她们办入伍手续、发军装。有关部门就女孩子的安排征求我的意见，结果她俩都到了部队医院，一个在镇江，一个在苏州。

田普开玩笑说：“我还以为你要送几个女兵呢，原来就两个啊，怎么不多领几个来呢？”这次到南京，许司令请我吃饭时，谈起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，似乎有说不完的话。许司令问我说：“这回你还去上海吗？”我说：“不去了！”他挥挥手说：“对，你别去上海了。今后，也不要当什么官了。”

那时物资紧缺，许司令问我：“你这次来，还有别的事要办吗？要买点什么东西回去吗？”我想了想说：“许司令，我想请您帮我买台自行车，在沈阳很难买到。”许世友立即告诉身边的人：“去，赶快帮他买一辆。”许司令退下来之前，我曾去北京看过他，那时他已经不能走路。离别时，他深情地对我说：“文举，你走，我不送了。”

在劫难逃

1968年3月下旬，各地开展“揭、批、查”活动，“中央文革记者站”也不例外，各地记者被召回北京，集中开会整风，让大家自我揭发或相互揭发问题。

陈伯达、康生、江青等对此极为重视，亲自到会讲话。说我们这儿是“庙小妖风大，池浅王八多”。

那天，我们面对面坐在会议室，我对陈伯达说：“趁在北京整风的机会，我们想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，能不能让我们实现这个愿望？”陈伯达仰着头，看也不看我一眼，用手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，说：“要见毛主席吗？这不很简单，那不是毛主席吗？你们看嘛！”

第二天，“中央文革记者站”通知我们，周总理、江青等人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解决江苏问题的会议，南京记者组的人也要参加。那天，南京记者组的负责人郑钧亭和我都去了。



图4 作者在上海黄浦公园。

那天的大会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坐在主席台上，我们坐在下面观众席上。参加会议的江苏造反派和领导干部代表约有三百多人，其中有许多认识我、或者我认识的造反派学生，有的还向我打招呼。

总理在讲话中，总结了前一段江苏“文革”的教训，提出了下一步实现“大联合”和“三结合”的要求，批评了造反派的一些做法。

接着，康生代表“中央文革”讲话，点了江苏省委统战部部长高

啸平的名，说他是“黑手”，同时提到高啸平到“中央文革”是邢文举带去的。坐在旁边的江青拿着笔，一边写一边念出了我的名字——“邢文举”。此时，在场的学生高声对主席台说道：《解放军报》记者邢文举也来听会了，就在现场！

江青一听，以其尖厉的声音对我高声喊道：“邢文举！你站起来，我差点没上你当！你在江苏搞了那么长时间，什么都没搞清楚！”我应声站起来，如五雷轰顶，我发现，全场的目光，像闪电一样集中到我的身上。

江青继续斥责我：“你欺骗我，欺骗党中央！江苏的问题就是让你给搞坏了！”“现在，你调到了哪儿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在上海。”江青站起身说：“你给我留在北京，你要检查交代，不要回上海了！”我听着，紧张得冒了一身汗，心想，这下彻底完了。

关键时刻，周总理接过江青的话说：“无产阶级司令部派出去的同志，有什么错误，就检讨什么错误，你不要紧张，要认真检讨错误嘛。”听了周总理的话，会场上鸦雀无声。谁都明白，总理的这番话是在保护我。

灾祸降临

那天徐学增也参加了会议，记者站刚开始整风，暂时还未涉及到他的问题。散会后，他在门口对我说：“老邢，你不要紧张，中央首长不了解情况，你把情况写清楚，我们向上报。”徐学增的话令我十分激动。没想到，在场的一位江苏学生把徐学增的这番话向“中央文革”汇报了，成了徐学增的一大罪状。

过了两天，在钓鱼台的一个小礼堂里，陈伯达、江青、姚文元等人接见“中央文革记者站”全体人员。江青的讲话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，她习惯一会讲这儿，一会儿讲那儿。她说，王、关、威的问题分步走，先解决了王、关，然后再解决戚本禹的问题。接着她话锋一转，说：“邢文举，谁说你的问题我们不知道，一会儿我再讲

你的问题。”

接着，江青批判起了自己的秘书，说他竟敢私自打开首长的抽屉，又说戚本禹写的某某文章是她给起的名字。现在，戚本禹野心膨胀……

姚文元说：“那天，江青同志点完邢文举的名字，徐学增还敢庇护他，胡说什么中央首长不了解情况，邢文举！你的情况我们早就了解，现在就给你讲一讲！”姚文元讲完话，我以为江青还要继续说我的问题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江青宣布会议到此结束。

会后，我又得交待姚文元批判我的所谓“假报告”问题。事情是这样的：1967年的一天，张春桥、姚文元在上海主持工作。在一个会议上，张春桥说，毛主席让我搞调查研究，看看将来邓小平能不能当选中央委员、陈丕显能不能当上海市委委员。

张春桥搞调研时，上海有人对他说过，不少同志认为，现在人们揭发出的邓小平问题很少，他当中央委员不行，但可以当中央候补委员；战争年代，陈丕显是红小鬼，可以当上海市委委员。

我将上述情况如实写成《简报》，上送“中央文革”。没想到姚文元直接给我打电话说：“邢文举同志，我给你提点意见行不行？你写的那份《简报》不真实，我已经下令把《简报》全部收回了。”

从1968年3月下旬开始，我被关押在全国总工会地下室“小号”里六个月。里面潮湿阴暗，每人一张床、一套《毛泽东选集》，门上有个小窗户。每天早上起床后，我们掏粪、种地、种菜、烧锅炉，或者交待问题、学习毛选、接受批斗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在我的问题上，姚文元和江青的态度不一样。据说姚文元讲过：“我对邢文举了解一些，对他不要太过分。”从“中央文革”的“小号”放出来以后，我回到“中央文革记者站”，继续反省和交待问题。在不少人看来，我的问题似乎从“敌我矛盾”变成了“人民内部矛盾”。

1969年4月底“九大”结束后，“中央文革记者站”解散，从全军借调来的人员全部返回了原单位。我终于回到了阔别近三年的部队。

躲过意外一劫

我回部队后，听说我的档案里有类似“不能重用”的文字。1970年夏天，组织上审查“五一六”分子，我被列入审查对象；1971年9月，“林副统帅”摔死在温都尔汗，我又受到审查。我记得，“九一三”事件后传达中央文件，上级特意安排我带领十名勤务连战士下乡种稻子。组织对我的审查，长达二十年。

那时，我虽然仍在七六七仓库政治处任宣传干事，但是不参加组织生活，不参加日常工作。

1973年，王洪文在党的“十大”上当选党中央副主席，成为风云人物。当年王洪文刚造反时，上海警备区为保护王洪文，让他住进了延安饭店。王洪文的老家是长春市二道河子，我的老家在九台县，彼此相距不远。作为老乡，我们来往得多些。

我们都住在延安饭店，经常见面唠嗑，相互还比较投缘。我有时坐他的车，他有时也坐记者站的车，我们还同坐过曹荻秋的车。

王洪文任中央副主席后，我曾给他和张春桥写过信。我回到原部队后，听说组织上一度想让我转业，心里有些急。我认为，我在“文革”中的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，现在转业，一是没单位敢要，二是今后审查起来无处申诉。我给王洪文和张春桥写信的目的，是想请他们说句公道话，让我先留在部队。开始我只想写给王洪文，又想到张春桥当上了总政主任，所以就分别给他们两人写了信。

没想到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有关部门从王洪文和张春桥住处抄出了我写给他们的信，按当时的说法，属于“效忠信”，我因此被怀疑是“四人帮”的“黑爪牙”。

我给王洪文的信大意如下：洪文同志，你当选党中央副主席，证明我们党和国家后继有人……我被江青同志点名，回到工作岗位，一直努力工作，改正自己错误。我希望组织如实审查我的问题，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。最后，代问江青、春桥、文元好……



图5 沈阳军区政委刘振华到作者单位考察。

给张春桥的信，我是写给张春桥和邓小平两人的。主要内容如下：张春桥主任、邓小平总参谋长：我在“文革”中犯有错误，曾受到江青同志批评，我回到工作岗位，时刻牢记江青同志的话，老老实实改造自己。但是，我是冲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第一线，现在，部队让我转业，是不公正的。关于我的表现，春桥同志是了解的……

凭我的经验，直接写信到北京，他们肯定收不到。于是，我先将信寄给上海王秀珍，请她转寄。后来得知，王秀珍真的把信转给了王洪文和张春桥。王秀珍附信说：“文举同志来一封信，请您一阅。”

1976年9月底，我所在仓库要买电视机，考虑到上海生产的电视机质量较好，上级就让我与仓库政治处干事田玉民一起，从大连乘船赴上海。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王局长的爱人是延安饭店的会计，她安排我们住进了延安饭店。

王秀珍派秘书来延安饭店看我，告诉我说，要买电视机可找陈阿大。但是，我怎么打电话，也无法找到陈阿大。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我才知道当时上层斗争相当激烈，华国锋、叶剑英正准备解决“四人帮”，在上海的“四人帮”死党紧张得很，哪里还顾得上帮我买电视机？

没有办法，我只好打电话与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王局长联系，说翌日到南京看看许司令。王局长回答说，你坐哪次车，明天我到车站接你。

我记得那是10月上旬的一天，我们乘火车到南京，左等右等不见王局长来接。我们乘上了南京军区的另一辆接站车，在车上，接站的干部说：“你知道不知道？‘四人帮’被抓起来了！”

我的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。我决定立即回沈阳，绝不能在这是非之地久留。从南京坐火车回沈阳，要到北京转车，票很难买。于是我们又从南京返回上海，下车后直奔码头，经大连回沈阳。

从1959年到1979年，我当了二十余年干事，这在全军恐怕也是极为罕见。不过，沈阳军区后勤部认识我的好心人，对我都挺不错，我基本没有受到什么严重歧视。特别是我们仓库的很多同志同情我、鼓励我。我这个人天性开朗、健谈。我觉得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是非自有曲直。

1979年，沈阳军区后勤部作了为我平反的决定，调我到七六七仓库被装修理所任教导员。经过多年努力，被装修理所被评为全军先进单位，总后在我们所召开了现场会，我个人立三等功一次。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、刘精松和沈阳军区政委刘振华曾多次莅临视察。1988年3月，我由副团职晋升为正团职，同时宣布退休。